

思與言 第41卷第2期  
2003年6月 頁1-36

## 情感和社會的互動： 清末民初文言與白話地位的轉變

林志宏\*\*



## 情感和社會的互動： 清末民初文言與白話地位的轉變\*

林志宏\*\*

本文藉由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三個面向的分析，來討論民初文言和白話爭論。作者從長時段的歷史脈絡與進程來探討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變化。第一部分，晚清知識分子在啓蒙民眾時有著「我們」／「他們」區別上的複雜情結。換言之，知識分子雖然以白話來喚起民眾，但他們自己仍然使用文言來書寫。第二部分討論的是二十世紀初的兩次社會結構的變革：即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與1911年辛亥革命。這兩次的變革更進一步促使了文言和白話地位的轉變，譬如以書寫文言來說，總是被視為君主復辟的象徵。最後，在以國家建構為前提之下，白話伴隨著出版資本主義市場而成為「國語」。可以說，所有這些關於文言和白話的發展都歸因於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情感和社會的互

\* 本文初稿曾於「第三屆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現代化與國際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變遷」（2002年9月1日至5日）發表，修改期間受到王汎森教授、潘光哲教授及張藝曠學長指教，李孝悌教授贈予相關研究資料，均此特致謝忱。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動」的結果。

關鍵詞：文言 白話 國語 胡適 清末民初

## 一、前　　言

歷史研究最困難也最吸引人之處在闡釋其中轉變的因素。對史家來說，一場事件的發生往往非暴生驟起，可能累積了如布勞岱（Fernand Braudel）所強調的長時間醞釀及複雜原因。更重要的是，無論事件導致的結果如何，它的影響或許原非參與其中的人物所可以預先設想的。如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觀察法國革命的影響時指出：那些曾經試圖將自己和傳統過去截然劃分為二的人，「他們的成就遠較外人所想像的和他們自己最初所想像的小」。<sup>(1)</sup>歷史猶如一台萬花筒鏡，它的翻轉和最後呈現出來的面貌，不見得完全按照人們事前的規劃安排來循序前進，倒是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插曲，反而撼動了整個的發展。

二十世紀初中國文言與白話地位的轉變，恰巧說明歷史經常具備難以預測的面向。發生在「五四」前夕的林紓（1852-1924）與蔡元培（1868-1940）之間關於文言和白話論爭，事件表面是以討論文字書寫形式為焦點，背後反映著民初新、舊兩方勢力之間的認同及衝突。到

---

<sup>(1)</sup>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 Doubleday, 1955), p. vi.

目前為止，相關研究已經汗牛充棟，<sup>(2)</sup>似乎沒有必要多作討論。不過問題是：這場論辯是否已經讓我們更清楚近代中國的變遷和面貌？事件主人翁之一林紓，正是清末翻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書而廣受歡迎的文人。根據錢基博（1887-1957）描述，「當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紓為師法」，<sup>(3)</sup>可見林紓文章影響力一斑。而林氏所譯著作，大抵以文言寫成，就連後來主張文學革命的胡適（1891-1962）和周作人（1885-1967），都不諱言早年曾受其感染。<sup>(4)</sup>然而，這位曾和嚴復（1854-1921）並列被視為晚清重要的翻譯家，<sup>(5)</sup>何以短短不及二十年間，其個人形象和文章卻成為衆之矢的，被唾棄甚至廣遭批評？

<sup>(2)</sup> 例如：羅志田，〈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收入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263-89。

<sup>(3)</sup>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台北：明倫出版社，1971），頁170。

<sup>(4)</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297；周作人，〈我學國文的經驗〉，收入氏著，《知堂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10。另外，周作人提到魯迅對林譯小說也有著相同的體驗。見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收在魯迅博物館等選編，《魯迅回憶錄：專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844-5。

<sup>(5)</sup> 康有為曾以「譯才并世數嚴林」來稱許二人。當然，嚴、林兩人並不以康的評語自豪，反倒認為這是污穢和忽視他們在古文的貢獻。直到一九三〇年代，一般提到近世翻譯的成就以嚴復、林紓為代表的看法，似乎仍很普遍。見康有為，〈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庸言》，第1卷第7號（1913年3月），頁1；咨實，〈嚴幾道和林琴南〉，原載：《中興週刊》，第104期（1935），未見，現收入：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頁228-32。

要明瞭這段歷史當中曲折，我們自然無法視民初白話文運動為破天荒創舉，也不能看做與過去毫無關連的「斷裂」。事實上，近年研究業已指出：推行白話文早自清末已有長足地發展；而民初文學革命主張以白話普及民衆，其實承襲清末啟蒙運動的啓示。<sup>(6)</sup>類似看法不僅顯示新文化運動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的位置，猶如層層高峰間一座比較更為高聳的山峰而已，而且也說明：要釐清這座凸出高峰的座標，得先環顧其他高峰的位置，並瞭解其方位才行。因此，在探討民初文言和白話之間爭論問題，特別是兩者地位轉變的關係，我以為須將它放在長時段歷史裡來考量。

文章開始前須先說明，我並無意嚴格去區分文言和白話的不同。究實而論，要想清楚地界定兩者形式與功能，非但恐將涉及聲韻語言學的知識範疇，即就實際的歷史情況而言，傳統士紳和民衆在使用文言或白話時，自己亦難以確切掌握兩者的差異，是以討論上要完全劃分其內容及關連，不僅不可能而且無必要。<sup>(7)</sup>此外，本文所指「文言」，只是概括性統稱的說法，目的為了區別以「白話」做為書寫和溝通的

---

<sup>(6)</sup> 李孝悌，〈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收在周策縱等，《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頁1-42；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聯書店，1997），特別是第六章。

<sup>(7)</sup> 中國文字基本上屬於表意的特性，故口語時往往將文言加以改造，使其繁複但卻易懂，這便成為白話。不過書寫時，大都仍是應用簡練的文言文體。因此一個人在「口語」和「書寫」之間，往往不會自覺到要限制自我是否該用文言還是白話？見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著，張世祿譯，《中國語與中國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頁14。

形式。當然，章太炎（1869-1936）及其門生在民初推倡魏晉駢文，就性質來說，亦屬文言的範疇；同樣地，清末白話的意涵也並不統一，如有稱為俗話者。但為求行文方便，以下將不擬詳分文言的種類，間或容有稱古文和文言。為求避免產生誤會，希望讀者能先瞭解。

本文討論的是文言與白話地位轉變的因素，目的在重新檢視清末民初中國文言和白話的發展。這裡我將嘗試分析二十世紀最初三十年間知識階層在使用語文上心態的變化。這些變化一方面促使了制度的改變（如廢除科舉和設立學堂），同時也在政治環境變革（如民國的建立）下進一步改變了原先的情感。以文言來說，在失去了社會組織、制度等維繫後，自然將被摒棄而認為是無須再固守的成分。這不得不讓我們想到Raymond Williams對「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的說法。他認為，新的世代有其新的「情感結構」，而新機制（new institution）正是顯現人們對情感的表達和想法。<sup>(8)</sup>反觀清末民初的文言逐步地失勢，取而代之建立白話的「國語」，這當中的轉變其實正是來自情感和社會間的互動，兩者缺一不可。

由於白話文涉及層面甚廣，因此我打算從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來思考此一問題。<sup>(9)</sup>選擇這篇文章固然因胡適個人在近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學史上曾起過建立新「典範」（paradigm）的作用，<sup>(10)</sup>此外尚有兩項因素。第一是這篇文章的性質凸顯出時代的意義。透過

<sup>(8)</sup>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48-71.

<sup>(9)</sup> 收入《胡適文存》(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90)，第二集，卷一，頁180-260。

<sup>(10)</sup>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29。

胡適綜論近代中國文學的發展，似乎等於宣告文言的終結，在意義上頗有「宣示」多於「回顧」之意。其次，該文撰於1921年，最初是為了要慶祝《申報》創刊五十週年而作，而當時白話文業已成為文學形式的主流。所以，胡適對清末民初文學發展的描述，可以得知主張白話文運動的舵手是如何看待這一課題，值得做為我們探討的起點。

以下將從胡文所提出的三組線索來討論：第一，清季白話文的使用，有著李澤厚所謂「救亡」<sup>(11)</sup>現實考量，代表著士大夫向普羅民衆灌輸思想或理念。胡適認為這樣的「啓蒙」或「開明」（這兩個詞所對應的均是英文enlightenment）具有某種階級的意識。第二條線索是從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和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來看對文言所造成的衝擊和影響；一次是制度的，另一次則為政治的，因為社會和心態的變化而導致文、白地位的逆轉。最後是民初國語運動的推展，胡適曾指出和白話推行之間的關連。這部分討論希望由「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角度來省思民國初年文言、白話論爭形成的意義。<sup>(12)</sup>

## 二、文白並存與啓蒙的複雜情結

大體而言，清末白話文運動是在「啓蒙」的風潮裡獲致長足地發

---

<sup>(11)</sup> 李澤厚，〈救亡與啓蒙〉，收入氏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書局，1996），頁1-46。

<sup>(12)</sup> 本文完成後，始見到王鳳的〈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之關係〉（收在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594-615），也注意到兩者間的關係，讀者不妨自行參看。

展。「啓蒙」之所以能形成普遍地風氣，一方面與一八九〇年代中國變法維新，為求救亡圖存、注重「群」學有關；<sup>(13)</sup>另一方面則因二十世紀初客觀環境變動而深化。特別是1900年發生庚子義和團事件，讓傳統士紳逐漸體認到：推動國家改革與進步的動力，並不能只侷限於士大夫而已，若是更多數的「愚夫愚婦」不能作為有力後盾，那麼國家改造也是徒然的。因此，勢必需要對普羅民衆進行再教育的工作。因為重視「啓蒙」，故需「開啓民智」。這一場向下層民衆進行的「啓蒙」工作，無論就地域範圍和普及程度而言，遠遠超過當時人的想像，影響深遠。<sup>(14)</sup>

不過，對清末白話文運動所具備的「啓蒙」角色，胡適在總結時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說：

二十多年以來，有提倡白話報的，有提倡白話書的，有提倡官話字母

<sup>(13)</sup> 當時的維新派土人認為「群」主要是透過兩種途徑來達成：一是縱向的，即是通上下之情來完成；一是橫向的，也就是大膽地要求破壞傳統中國的倫理結構。見王汎森，〈「群」與倫理結構的破壞〉，收入氏著，《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附錄部分，頁244-5；Wang Fan-sen, “Evolving Prescription for Social Lif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From Qunxue to Society,” in Joshua A. Fogel and Peter G. Zarrow ed., *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7), pp. 258-278.

<sup>(14)</sup> 當時「啓蒙」的形式與內容呈現相當複雜多元，非但藉助了傳統裡戲曲及宣講的功能，其他如演說、閱報社的成立，都說明知識階層以實際的行動來「開通民智」。這方面討論可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的，有提倡簡字字母的……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他們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作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sup>(15)</sup>

胡氏認為清末推動白話文有兩項缺點：第一，舊文學基本上帶有貴族式的味道，它不屬於一般民衆的。「啓蒙」其實只是場由上往下發展的單向運動而已，是士紳對廣大不識字的民衆進行教育。這其中隱然指涉了階級意識。第二，「啓蒙」本身是「有意主張白話」，目的在喚起救亡的意識，而非推行白話文學。是以對文學層面來說，清末啓蒙仍屬「無意」的取向。

可是胡適的描述有兩點值得釐清。首先，對清末的知識階層來說，如何使用具有「啓蒙」性質的語文，並且其範疇究指為何？此外，以文字做為開啓民智手段是否真的能達到功效？其次，為什麼早年曾經參與《競業旬報》撰寫白話文的胡適，<sup>(16)</sup>後來會對清末白話文運動抱持上引負面的想法？

以目的言，清末知識階層使用白話文，很明顯的，「工具性」的功能超越一切。不過嚴格說來，白話文究竟要以怎樣的形式來書寫，當時並無定見。1897年汪榮寶（1878-1933）即指出報刊文字深奧難懂，不易為普通民衆接受，但他也沒有提出如何解決的辦法，只是「甚願

<sup>(15)</sup>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頁247。

<sup>(16)</sup> 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72-3。這些文章現收在周質平編，《胡適早年文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

諸操觚握槧者，姑卑下其體，以曉淺人，毋令其棘吻鉤唇，發響而氣沮，指掌畫肚，望文而義遁。」<sup>(17)</sup>為了「通上下之情」，知識階層最先注意到的是傳統小說裡的語文，認為對喚醒民心極具重要功用。康有為（1858-1927）便說識字的人也許不會去閱讀經書、正史、語錄及律例，但卻可能讀小說。<sup>(18)</sup>提倡「小說界革命」的梁啟超（1873-1929）也深表同感，指出「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莫】由。」<sup>(19)</sup>小說在過去中國文學領域裡除了明末公安派有過同樣的重視以外，<sup>(20)</sup>以「改良群治」為目的而推行白話小說，幾乎要到一九〇〇年代後，始為普遍的共識。<sup>(21)</sup>

然而清末語體和文體的關係，實存文、白互用的情況，並非鮮見。儘管早已有人高舉「崇白話而廢文言」的旗幟，<sup>(22)</sup>但整體來說，使用

<sup>(17)</sup> 汪榮寶，〈論新報文體〉，《實學報》（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7），第11冊，總頁691。

<sup>(18)</sup> 《日本書目志》，卷十三，識語部分，收入康有為著，姜義華編校，《康有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三冊，總頁1212-3。

<sup>(19)</sup>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飲冰室文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0）之十，頁8。

<sup>(20)</sup> 對於此一問題，周質平的研究有充分的說明。見周質平，〈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兼論袁宏道的生平及其風格〉（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六章，頁95-121。

<sup>(21)</sup> 阿英編，《晚清小說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台二版），頁3-4。

<sup>(22)</sup> 譬如裘廷梁的〈論白話為維新之本〉，可能是最早言及白話用處的文章。該文原載：《無錫白話報》，未見，收在舒蕪等編選，《近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頁176-80。

文言在知識階層裡畢竟已有相當長的時間，要完全摒棄其結構和語法，終究並非易事。更進一步言，清末維新志士與其說是使用白話，不如說是將文言譯為白話。周作人檢討清末文學的發展時，曾舉一本名為《女誠注釋》的序言為例，說明當時文言、白話之間確實出現掌握困難的窘況。他指出寫序的作者所形諸的文字雖為白話文，不過很明顯地可以看到是經由古文的語法想出後，再以白話的方式寫出。<sup>(23)</sup>周氏以讀者的體驗來回顧這段經歷，相信是極具代表性的。之所以會有此境況，原因在於：白話從來就不是士人做為撰述寫作的主要體裁。如果文章純以白話方式來思考，恐將冗繁；而且許多文言所以得以表達的詞彙，白話也未必立刻可以相應。因此，梁啟超、魯迅才會有不得不「參用文言」的說法。<sup>(24)</sup>

從文言、白話並存情形得知，清末啓蒙確呈雙重的複雜性，即胡適所稱的「他們」、「我們」之區別。這兩種區別代表當時思想心態，如夏曾佑（1863-1924）的形容，可以概分為兩派：一則學士大夫，另一則採婦人與粗人口吻。小說創造的目的，就是在解除後者無法閱讀書籍的情形。<sup>(25)</sup>夏氏的看法說明啓蒙背後其實有著文言和白話的兩群讀者。在「啓蒙」的過程中，識字的一群顯然可以接受文言的書寫；

<sup>(23)</sup>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51。

<sup>(24)</sup> 見梁啟超譯，〈《十五小豪傑》（第四回）〉，《新民叢報》，第6號（1902年3月），頁83；魯迅，〈《月界旅行》辨言〉，收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第十冊，《譯文序跋集》，頁152。

<sup>(25)</sup> 〈小說原理〉，原載：《繡像小說》，第三期，未見，收在舒蕪等編選，《近代文論選》，頁206-7。

但對不識字的民衆來說，言文合一掌握的問題便有困難，故須藉助白話使用來普及思想。實際上，衡諸書寫形式的普遍情況而論，文言確實在清末比較受到歡迎。<sup>(26)</sup>可是從「啓蒙」功效來說，恐怕又非如此。

嚴復翻譯《天演論》等西書同樣亦展現類似情形。衆所皆知，嚴復的翻譯對晚清思想界有深刻的影響。然而，嚴譯文體卻是文言式的古文，其引發的反應很可以看出清末啓蒙的雙重趨向。例如古文大家吳汝綸（1840-1903）欣賞嚴復的翻譯，原因不在內容本身，而是「嚴子之雄於文」，「其書乃駁駁與晚周諸子相上下」。<sup>(27)</sup>相較於吳氏的推崇，嚴的譯作當時並非無人提出異議。梁啟超就認為嚴譯文筆過於淵雅，似乎令讀者難以理解，又說：「況此等學理邃蹟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結習，吾不能為賢者諱矣」，<sup>(28)</sup>便道出對「啓蒙」的見解和吳汝綸不同。黃遵憲（1848-1905）則持中庸的看法，以為譯著應先區分讀者群。像是《名學》，應該採取文言；而《原富》之篇，則應擬用白話。<sup>(29)</sup>嚴復對於梁啟超看法的反駁，似乎印證了胡適所言區別「我們」、「他們」的意識，說：

<sup>(26)</sup> 這裡我是根據包天笑個人的觀察而斷。見包天笑，《訓影樓回憶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頁221。

<sup>(27)</sup> 吳汝綸，〈《天演論》吳序〉，收在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五冊，總頁1317-8。

<sup>(28)</sup> 梁啟超，〈紹介新著：原富〉，《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頁115。

<sup>(29)</sup> 〈黃遵憲致嚴復書〉，收在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五冊，總頁1571-2。

若徒爲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於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蹟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目睹中國之古書，而欲稗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sup>(30)</sup>

觀嚴復之意，他翻譯的西書的讀者群是鎖定在所謂「能讀中國古書之人」；也就是說，嚴的「啓蒙」對象是那群飽受傳統教育的士紳階層。章太炎認為作文應當「修辭立其誠也，自諸辭賦之外，華而近組則滅質，辯而妄斷則失情」，他批評嚴復的譯著如制舉之文，<sup>(31)</sup>其實是有所誤解，因為嚴譯設想的讀者群正是在預備考功名的知識階層身上。

值得推敲的是嚴復翻譯著作所達及「啓蒙」民衆的功能。胡適曾形容嚴復翻譯《天演論》過於古奧難懂，未必足以吸引青年；不過透過學堂傳授，以及現實環境刺激下，進化論的思想卻在他青年時期有如野火般迅速發酵，成為潮流。<sup>(32)</sup>儘管胡適的回憶說明，清末「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口頭禪雖轟動一時，然而實際真正能夠瞭解其中精義者，恐怕不過寥寥少數；多半只是震懾於嚴復盛名，而將之形成口號。比如《穆勒名學》出版後，留學日本的朱執信（1885-1920）便表達過類似的看法。朱氏指出關於名學的著作從明代以來便已有之，可是「嚴氏譯名學後，世乃知有一科學，爲思之法則爾。然吾竊觀世

<sup>(30)</sup> 〈與梁啟超書二〉，同前書，第三冊，總頁516-7。

<sup>(31)</sup> 〈與人論文書〉，《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二，收在湯志鈞編，《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四冊，頁167-8。

<sup>(32)</sup> 胡適，〈四十自述〉，頁54-5。

之讀名學者，什九震於嚴氏之名而已，以云深喻，殆未可也。」<sup>(33)</sup>朱執信的觀點容或有個人主觀意見，不可全信；但是包天笑（1876-1973）的經歷卻可另為一佐證。據《釤影樓回憶錄》所云，1905年左右，包氏邀請嚴復到上海來講演名學，許多名流都慕名而來。包在事後對聽講的感覺是不能甚解其道，「這次來聽講的人，我知道他們不是聽講，只是來看嚴又陵，隨衆附和趨於時髦而已。」<sup>(34)</sup>小野川秀美曾以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 1809-1882）與赫胥黎（Thomas H. Huxley, 1825-1895）的關係來比喻嚴復與梁啟超。他敏銳地指出，實際上推動進化思想的人是梁啟超，而非嚴復。嚴譯著作裡並沒有採用日譯名詞，像是「自然淘汰」、「優勝劣敗」的詞彙，其實是經由梁啟超從日本所傳過來的。<sup>(35)</sup>這也適足說明為什麼歷史上實際造成思想變動和影響的功臣，往往可能並非是提出原創性學說的人。

關於文字著作功能的侷限性，另一位可資佐證的是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林紓。林紓以文言古文翻譯西洋小說，可以說膾炙人口。除了內容生動活潑之外，他的小說確實達到了古文前所未有的境地。胡適說林譯小說開創古文長篇的體例，是司馬遷以來所不曾有的。<sup>(36)</sup>就連周作人也認為林紓翻譯讓他領略到古文的興味之處。<sup>(37)</sup>不過，這都只

<sup>(33)</sup> 縣解（朱執信），〈就論理學駁新民叢報論革命之謬〉，《民報》，第6號（1906年7月），頁65。

<sup>(34)</sup> 《釤影樓回憶錄》，頁289-91。

<sup>(35)</sup> 小野川秀美著，林明德、黃福慶譯，《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頁295。

<sup>(36)</sup>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頁200。

<sup>(37)</sup> 周作人，〈我學國文的經驗〉，頁10。

是關於識字的知識階層的言論。對那些無法閱讀林譯小說的一般民衆而言，透過死文字所表達的方式，效果恐怕遠不如演說和戲劇的傳達來得迅捷。如衆周知，林紓所翻譯的小說，後來有多部成為戲劇的腳本；倒是這些戲劇可能發揮了更為普及地影響力。歐陽予倩（1889-1962）憶述道，在東京活動的春柳社便嘗多次援用茶花女、黑奴故事做為演出題材，他的感受是很驚奇，瞭解到「戲劇原來有這樣一個辦法！」<sup>(38)</sup>陳獨秀（1879-1942）在1904年導出「戲館子是衆人的大學堂，戲子是衆人的大教師」結論，也透露出戲劇對思想啓蒙的意義。<sup>(39)</sup>

綜上所述，清末的知識階層對於「啓蒙」和運用白話有著複雜的情結，言文合一顯然是他們亟欲達成的目標，可是知識階層內心卻有「他們」、「我們」地位之別。章太炎行文時，很清楚的分別出使用不同語文所該表達的場合：在《教育今語》雜誌使用白話，在文學上則提倡魏、晉文字。顧頡剛（1893-1980）也觀察到這一點。顧說「清末人士提倡白話，有一公同之意見：即白話用于通俗，文言專為學者設」，<sup>(40)</sup>不僅點出清末文言、白話並存的情況，也進而說明知識階層自己的心態。

<sup>(38)</sup> 《自我演戲以來》（台北：龍文出版社，1990），頁7；《〈黑奴恨〉後記》，《歐陽予倩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第一卷，頁527-8。

<sup>(39)</sup> 三愛（陳獨秀），《論戲曲》，《安徽俗話報》，第11期（1904年8月），頁1-2；這方面討論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頁154-7。

<sup>(40)</sup> 以上章太炎的例子和顧頡剛看法均見於《顧頡剛讀書筆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第一冊，「文言改為白話」條，頁257-8。

必須指出的是，清末「啓蒙」的內容已非傳統的知識階層所能完全掌握，甚至由他們來主導。無論是以白話還是文言來啓蒙民衆，所講的知識內容並不是「士」原來所必須具備的，故他們的優勢條件不再。從學習的性質和目的而論，西方應用性的專業知識開始取代了傳統「通儒」理想，成為一切知識的準繩。<sup>(41)</sup>這樣「學習西方」的心態卻逐漸因為政治變動和制度改革開始鬆動，最後則造成變化。知識階層於是跟著普羅民衆一起學習，乃至認為自己所擁有的知識不符合時代需求，是「偽知識」。結果促成知識階層的邊緣化，進而是對自我的貶抑。<sup>(42)</sup>如此心態的變化，開啟了文言失去優勢的第一步。

(41) 西學在中國知識界盛行，大致在戊戌時期前後開始。傳統學術顯然不敷時勢需求，即如科考內容而言，《經世文編》也開始受到重視。當時士人面臨這樣境況發出的感嘆和不平似乎十分普遍。如劉聲木（1878-1959）的《莫楚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便有記載。如謂昔日有人以官爵來刻圖章，遂後有「三次歐洲」、「二次美洲」、「東瀛往返八次」為圖章，是「直以行路為官銜招牌」（《續筆》，卷八，總頁418）。而劉氏在一八九九年對兒姪的信說：「西文為當今投時利器，然如果有人立身端正，文筆條暢、辦事精勤，可患無出人頭地之一日，豈必非讀西文，遂無立足地乎！」（《四筆》，卷十，總頁878）可見劉聲木認為讀書士子處事出路之道，屬於傳統知識階層的看法；與戊戌以後崇尚西學的態度迥異。

(42) 知識分子逐漸成為社會上無用的一群，這種變化在近代中國史其實是項十分複雜的課題。關於此一方面的討論請詳參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2），頁33-50；王汎森，〈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變〉，《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6期（2002年5月），頁1-28。

### 三、兩種變革：廢除科舉與辛亥革命

知識階層自我心態的轉變，隨著清末維新派著重「群」學和重視人民「啓蒙」而發展，但倘若沒有現實環境的配合，恐怕還不致造成後來文言與白話地位的逆轉。這其中的因素，我們可從廢科舉與辛亥革命兩項關鍵事件來檢視。

#### （一）科舉制的廢除

從晚清的歷史脈絡來看，廢除科舉儼然為一股必然的趨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科舉的廢除使得傳統仕紳的仕、學合一之途中斷，不但改變了中國整個以士紳為主的四民社會結構，也進而造成清帝國缺乏統一思想基礎。從社會結構來說，定期舉辦科考，既是士紳藉以獲得、維繫和累積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主要方式，也是想要進階社會地位的必要過程。許多來自士紳家庭的子弟，不僅以獲取科舉功名為無上殊榮，也將參加科考以達仕宦之途用來作為自己教育下一代的目標。可以說，士人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使得他們處於社會結構的中心位置；而科舉制度與以「士」為首的四民社會息息相關，同時亦是整個中國社會千年來所共同形塑的習性（habitus）。<sup>(43)</sup>如今這

<sup>(43)</sup> 科舉制度所造成中國社會流動和政治文化的討論，可參考何炳棣及Elman的研究。見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這裡所稱的「文化資本」、「習性」，主要是借用Pierre Bourdieu的看法。Bourdieu

項考試制度不再成為常規，無疑將打破四民社會結構，對長期慣以科舉優勢做為提升社會地位的讀書士人而言，簡直形同晴天霹靂。身處山西的舉人劉大鵬（1857-1942）親歷清末科舉廢除的狀況，形容士子「士心渙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讀書想，別圖他業」，「同人之失館者紛如，謀生無路」，仰嘆讀書人的無用；而他自己後來也無法再經營私塾教學，只好轉向開採煤礦事業，適足說明傳統士紳所面臨的困境。<sup>(44)</sup>

對統治者來說，廢科舉無異等同在思想箝制方面自廢武功。因為科考內容主要係以官方所認可的傳統經書作為範圍，赴考的士子想要順利通過考試，則須在書寫文字和語言的使用方面合乎官方要求才行。如衆周知，傳統士紳在準備科舉考試之際，為求具備有作詩的平仄、押韻等知識，必須廣泛地閱讀韻書。並且這些通過科考的士子們，尤其需要熟習古籍經典上文字，以便將來具備瞭解帝王祖訓和國家施政

---

將文化資本區分為三層面：身體化、客體化及制度化。身體化指的是因學習場域而獲得的行為方式及能力，如語言的使用；客體化指的是經濟資本的累積，如財富的取得；制度化指的是「資格」形式，如學歷。習性在某種意義上是個人或社會由內在所形成的潛意識，它同時說明文化階序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將形成「再生產」(reproduction)的局面。譬如：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子弟，他們就學的機會比例可能較工人子弟來得高。見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一書的討論。

<sup>(44)</sup>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1905年10月15日至12月25日條，頁146-48。相關討論亦可見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收入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頁161-190。

方針的能力。<sup>(45)</sup>這樣的考試形式及內容，一則既是為了要維持一套共同的評斷標準，一則又是得以達到思想上強化歸屬和規範為目的。<sup>(46)</sup>可是，廢除科考的結果，使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古典知識與文字，如今都不再獲致應有的重視。至於原先端賴科舉制而存在的文言，頓時失去依附。從統治官方的角度來看，朝廷藉以傳達忠孝節義等思想的媒介受到阻礙，取而代之的卻是自西方和日本傳來的各種主義與思潮。這非但將危及統治者本身的正當性，也促使傳統文化開始受到嚴厲地挑戰。

失去科舉做為統一思想的工具，以八股為主要體裁的文言勢必無法再具有強勢的地位，結果不言可喻。這樣的情況提供了民初文學革命推行白話文有利的環境。無怪乎胡適曾斬釘截鐵地說「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存在，白話文學運動決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sup>(47)</sup>指稱廢除科舉制度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 （二）辛亥革命

如果說教育的變革往往是政治動盪的前奏，<sup>(48)</sup>那麼，1911年的辛

---

<sup>(45)</sup> 宮崎市定，《科舉》（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頁190-1。

<sup>(46)</sup> 近人討論指出：明清時期科舉呈現出官僚體系一體化，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再生產」最重要的因素。見Benjamin Elman,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 1 (February 1991): 7-28.

<sup>(47)</sup>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頁246。

<sup>(48)</sup> 傅斯年，〈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收入氏著，《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第六冊，頁86。

亥革命適足說明使用文言在科舉廢除後即將面臨到更艱困的境地。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專權，造成所謂普遍王權（universal kingship）的崩潰。<sup>(49)</sup>這場鉅變所帶來的政治、社會、文化與價值的改變，仍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文言即其顯例，它被賦予作為政治符號和新、舊社會觀象徵，後來更成為和白話地位逆轉的關鍵因素。

辛亥革命後最初數年間，新與舊的變化隨著政治局勢的演變而日趨激烈。有關服飾、禮儀、道德倫理、戲劇、中西醫問題乃至婦女女權方面，都成為新、舊兩派人士議論的焦點。<sup>(50)</sup>當時有人指出「國中現象，變幻離奇，蓋無在不由新舊之說淘演而成」，又說「上自國家，下級【至】社會，無事無物不呈新舊之二象。吾人與事物之緣一日未斷，則一日必發生新舊問題。」<sup>(51)</sup>社會上之所以不斷發生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皆因伴隨新舊政權更迭、思想尚未建立普遍性的規範緣故。人們都在新、舊兩方勢力中試圖尋求平衡或抉擇。<sup>(52)</sup>

在衆多爭論議題之中，讀經是否應該廢止尤其受到普遍的關注。這項議題的產生當然與教育的改革有關。自從科舉制度廢除以來，經

<sup>(49)</sup>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Past and Present,"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76-88.

<sup>(50)</sup> 最近一本討論民國公民的形成專著裡，便分析到上述有關主題。見Her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9-83, 93-117.

<sup>(51)</sup> 汪淑潛，〈新舊問題〉，《新青年》，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頁32。

<sup>(52)</sup> 關於這方面，建議讀者直接參看劉志琴主編的《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特別是第三冊，便可嗅到時代的風氣。

書面臨「去神聖化」危機，並不再具有實用的功能，轉而成爲各級學校裡修身或倫理課程的內容。辛亥革命後，由於高唱平等觀念，遂使傳統「經典」的地位更難維持。讀經講經的活動本來在中國深具社會重整（social renormalize）功能，此刻亦隨時代氛圍而變化，被認爲是亟需改革的部分。1912年7月，蔡元培在北京主持中華民國第一次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便稱「中國政體既然更新，及社會上一般思想，亦隨之改革」。<sup>(53)</sup>次年教育部頒佈「壬子癸丑學制」法令，明令廢止小學讀經講經的課程，並將大學經課併入文科。讀經的活動雖一度遭到教育界革新風氣的遏止，不過在民間仍具影響力。<sup>(54)</sup>而在一連串讀經與其反對的聲浪中，文言其實扮演著相當微妙的地位。因爲就做爲課程傳授內容來說，使用文言是因讀經的需求而存在，故兩者的關係甚深。文言不僅是經書書寫形式的主要體裁，而且也象徵了「道」之所在。特別是晚清以來桐城派古文盛行，在強調「文以載道」的前提下，讀經幾乎被視爲是修身的根本之道。

民初袁世凱主政時期，代表傳統的復舊勢力仍然持續在社會上活躍。各式各樣的尊孔、讀經講經的活動此起彼落，既和清遺老的復辟

<sup>(53)</sup> 〈蔡元培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開會詞〉，收在中國歷史第二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第三輯「教育」，頁626-9。

<sup>(54)</sup> 譬如上海雖爲開明之地，各小學校讀經雖已廢止，但私塾仍多抱持不變的態度；廣東則小學校反對者甚多；而經學家廖平到北京時，也還仍受到歡迎，殆見尊經仍在民間頗具基礎。見《申報》，〈雜評三〉，1913年5月18日；《申報》，〈粵教育界爭廢止讀經問題〉，1913年5月18日；《申報》，〈歡迎國學大家廖季平大會〉，1913年6月13日。

清室活動結合，也與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的構想相契。康有為等孔教會的成員首先要求將讀經再列入學校課程。此後嚴復、王學曾等人則利用袁世凱頒佈恢復祭天祀孔典禮令，要求設立經學館，認為幼學讀經，將有助於倫理教化之功。<sup>(55)</sup>當時的教育總長湯化龍（1874-1918）雖不同意中小學讀經，卻聲明「修身或國文課程中採取經訓」。<sup>(56)</sup>後來在1915年間頒佈〈特定教育綱要〉裡，規定恢復中小學讀經。這一份綱要宣布，令守舊者歡喜雀躍，於是廢除小學校、恢復科舉的謠言就此流傳開來。<sup>(57)</sup>可以看出，閱讀經書因時代和政治氣氛下成為復舊的象徵，而運用文言自然也就被視為和舊文化勢力的關係劃上等號。

隨著洪憲帝制失敗，知識階層在接連經歷復辟事件後，對中國政治的改革感到絕望，於是不利文言開展的困境逐漸形成。魯迅（1881-1936）回憶民初以來心態的轉變歷程，似乎可說明此一情況。他提到民國元年待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可是隔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sup>(58)</sup>又說到1918年作白話小說時的心情是：

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

<sup>(55)</sup> 《申報》，〈政治會議結束議案之預備〉，1914年6月月10日；《申報》，〈嚴又陵之讀經說〉，1914年6月月14日。

<sup>(56)</sup> 湯化龍，〈上大總統言教育書〉，《庸言》，第2卷第5號（1914年5月），附錄，頁2。

<sup>(57)</sup> 劉志琴主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三冊，頁231-4。

<sup>(58)</sup> 《兩地書·八》，收在《魯迅全集》，第11冊，頁31。

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59)

魯迅的感受很可能並非偶發的少數。民國初年政治局勢動盪不安，的確讓知識分子愈看愈深覺悲觀。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有著類似的經歷。<sup>(60)</sup>在如此氛圍中，改革的新思想與文化口號遂開始出現，《新青年》成為其中代表。而對時局憂憤的結果是促使周氏兄弟紛紛參加《新青年》的文學革命運動。

需要指出的是：周氏兄弟早年原先都曾以古文翻譯過外國小說。他們對白話小說最初都抱持反對的立場，但後來卻以進行「思想革命」之必要，而改以白話。<sup>(61)</sup>這一想法的變化十分耐人尋味。對知識階層來說，文學的革新不啻是文字表面而已，其實也觸及如何改革國民心理的層面。柳亞子（1887-1958）本來也是傾向反對白話文的，認為「文學革命，所革當在理想，不在形式」，主張形式宜舊，理想宜新；可是漸漸發覺用文言來發表新思想，很感困難，於是恍悟白話這一新工具存在的必要。<sup>(62)</sup>傅斯年（1896-1950）就指出反對古文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它晦澀難解，無法正確地表達和理解字裡行間的意義。文學之所

---

(59) 〈《自選集》自序〉，收在《魯迅全集》，第四冊，《南腔北調集》，頁455。

(60)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頁382。

(61) 同前書，頁383。

(62) 〈與楊杏佛論文學書〉，原載：《民國日報》，1917年4月23日，收在王晶垚、王學莊、孫彩霞編，《柳亞子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上冊，頁166-7；柳棄疾，《南社紀略》（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6），頁123。

以要進行革命，就是要使民衆思想能夠幡然改變，進而促動對人生的自覺心。<sup>(63)</sup>傅的說法無疑恰當地投射出《新青年》作者群共同的想法，也說明當時知識分子在情感上的轉變：為了擺脫舊思維，他們認為只要和傳統相關的部分都必須剷除；要建立新思想，文言代表的既是「死文學」，又是舊傳統，理所當然符合在近人所稱「整體性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心態，<sup>(64)</sup>成為迫切需要改革的部分。<sup>(65)</sup>

因此，科舉制度廢除和辛亥革命在社會上發生極大的影響。這兩次的變革，一次是制度的改革，一次則是政治的變動，結果均造成文言和白話地位的逆轉。從制度改革來說，文言因廢除科舉而失去了獨佔的權利，識字的民衆無須依循固定的文章格式寫作。至於政治的變動，造成自由、平等的思想普及，以及普遍王權衰落，加上文言逐漸披上具有「腐敗反動」的外衣，最後是既有的優勢地位顯然不再。

#### 四、白話與建立現代國家

那麼，需要再進一步追問是：白話何以成爲文學主流？它又如何

<sup>(63)</sup> 傅斯年，〈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新青年》，第1卷第5號（1919年5月），頁913-19。

<sup>(64)</sup> 「整體性反傳統主義」爲林毓生所提出。見林毓生，〈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收入氏著，《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121-38。

<sup>(65)</sup> 胡適、陳獨秀在答覆易宗夔的書信中便說：「舊文學、舊政治、舊倫理，本是一家眷屬，固不得不去此而取彼」，見《通信：論〈新青年〉之主張》，《新青年》，第5卷第4號（1918年10月），總頁433。

## 取代文言，成為主要書寫形式？

白話地位的提高，客觀環境當然功不可沒。尤其是教育普及和識字率的提高，這兩項因素都對推展白話形成莫大助益。據Evelyn S. Rawski討論清代教育和通俗文學的研究指出：十八、十九世紀中國粗通文字的人，男性的比例已達30%至45%，而女性也初步達到2%至10%。<sup>(66)</sup>這些統計數字雖然未必精確，可是此一情況到清末之際勢將更形熱絡，隨著獎勵實業教育、發展工商相互輝映而比例持續成長。歐洲史家曾指經濟發展和大眾讀寫能力間有著密切地關連，<sup>(67)</sup>反觀中國到一九一〇年代，都會地區的工商發展熱絡，促使城鄉人口的流動頻繁，似乎也說明將助長教育普及的條件。陳獨秀所謂「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sup>(68)</sup>洵非印象式的虛言。

然而除了教育普及造成識字率提高外，白話與國語運動的推行，彼此間亦有相輔相成之效。中國文字統一的工作早自秦朝便已達成。「同書文字」（《史記·秦始皇本紀》）雖有利於形成民族共同認同，但以語言的角度來看，由於文字表述與音聲關係所產生地域性差異，方言隔閡的問題始終存在。就整個明清帝國的漢字文化圈而言，「方言」所對應的是中央官方（特別是北京方面）的「官話」；並且「方言」本身即具有非標準化（non-standard）的意味。直至十九世紀後半期，「廣方言館」的設立，就是將外國語視為非官方的語言之意。同樣屬

<sup>(66)</sup> Evelyn S.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 22-23, 89.

<sup>(67)</sup> David Vincent, *The Rise of Mass Literacy: Reading and Writing in Modern Europe* (Oxford: Polity Press, 2000), pp. 63-88.

<sup>(68)</sup> 陳獨秀，〈答適之〉，收入《胡適文存》，第二集，卷一，頁153。

於漢字系統的日語和朝鮮語，也被看做是「方言」的一部份。<sup>(69)</sup>清末以來，文字的書寫和口語化一直是知識階層努力的方向。不過，如何建立普遍性的語言，以完成國家統合與流通，兩者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1894年甲午戰後，統一語言的工作開始在知識階層裡形成普遍共識。一方面，士人體會到「言文相離之害」的論調日趨高漲；另一方面，東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朝野間開啓擺脫漢語漢字、尋求「言文一致」的改革，也引起了中國知識階層的注意。<sup>(70)</sup>清末最後十數年間，先後便有盧懸章（1854-1928）的「切音新字」、王照（1859-1933）「官話合聲字母」及勞乃宣（1843-1921）「簡字全譜」等運動的推行，<sup>(71)</sup>並且深獲民間的重視。清廷在1903年《奏定學堂章程》公布新教育制度便聲明「擬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中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sup>(72)</sup>顯見想將官話作為統一語言

<sup>(69)</sup> 村田雄二郎，〈「文白」の彼方に——近代中國における國語問題〉，《思想》，853（1995）：7-8。

<sup>(70)</sup> 例如裘廷梁、梁啟超等人均是。見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頁180；梁啟超，〈沈氏音書序〉，原載：《時務報》，收在《飲冰室文集》之二，頁1。有關日本明治期間的「言文一致」問題，以及近代語的形成，詳參森岡健二編，《近代語の成立：文体編》（東京：明治書院，1991）；酒井直樹，〈死産される日本語・日本人—日本語という統一体をめぐる制作（反）歴史的考察〉，《思想》，845（1994）：5-36。

<sup>(71)</sup>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上海：上海書店，1992，據商務印書館影印），頁10-33。

<sup>(72)</sup> 張之洞等，《奏定學堂章程》（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1970），〈學務綱要〉，總頁79。

的目標。

民國肇建，國語統一的基本方針仍延續前清的立場。臨時政府教育部成立「讀音統一會」，依照章太炎的辦法，創立「注音字母」，開啓國語運動之先聲。<sup>(73)</sup>不過，注音字母在1916年以前學術界頗不重視，主要原因是教育中語言和文字的使用，仍然未形成共識。

最初將白話和國語運動的關係結合起來是1916年設立的「國語研究會」。這個組織的出現，親歷其間的黎錦熙（1890-1978）有充分的描述。黎在洪憲帝制失敗後，便與教育部的友人「有感這樣的民智實在太趕不上這樣的國體了」，於是希望透過教育來改革。黎氏和友人討論到「民智」及「國體」之間問題，也反映出情感上迫切轉變的心態。他回憶當時的情形是：

……想來想去，大家覺得最緊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問題還是文字問題，便相約各人做文章，來極力鼓吹文字底改革，主張「言文一致」和「國語統一」；在行政方面，便是請教育長官毅然下令改國文科為國語科。<sup>(74)</sup>

後來便結合了有志之士組織「國語研究會」。在這裡，黎錦熙的敘述值得注意是將「國文科」改為「國語科」。根據黎的說法，1914、1915年間，教育部小學教科書主編們每每想主張將國文改為國語，不過反應卻是「聞者但微笑」而無人齒及，原因是守舊者的反對。<sup>(75)</sup>何以守

<sup>(73)</sup>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頁50-65。

<sup>(74)</sup> 同前書，頁66。

<sup>(75)</sup> 同上，頁107-8。

舊者會持反對態度？原來是將「國文」改成「國語」其實還透露出深刻意涵：它不僅確認教育的步驟應先從淺顯的口語文章方式表達，而且也為白話文學提供有力的媒介。這同時似乎也間接否定了文言在教育上絕對的優勢。後來教育部終於在1920年頒佈命令，決議將國民學校一、二年級的國文改成國語。雖然這項制度直到兩年後才全面成功，不過與「國語研究會」會員的努力有著極其密切的關連。<sup>(76)</sup>

《新青年》的編輯群原先對推行國語統一，並非那麼熱中。陳獨秀早年雖對音韻方言之學頗有涉獵，然而不認為「國語統一」深具重要性。<sup>(77)</sup>直到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新青年》的編輯們才警覺到提倡國語對推行白話文的影響，國語運動於是有了明確的方向，提倡白話文遂與此合流。錢玄同（1887-1939）是最先注意到這個問題的人。他指出民初當時各界對「何為國語」的議論紛紛，認為既然沒有「標準的國語」形式，何不以白話做為嘗試？錢氏的看法是：「這個『標準國語』，一定是要由我們提倡白話的人實地研究『嘗試』，纔能制定。我們正好借這《新青年》雜誌來做白話文章的試驗場。」<sup>(78)</sup>劉半農（1891-1934）後來的說法也提供了堅實有力的證據。劉說：「自從有了民國五年文學革命，國語一件事就漸漸的建造於一個穩固的基礎上。我們應當注意：我們是直到了此刻，才能明瞭白話文的真價值。」

<sup>(76)</sup>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頁256。

<sup>(77)</sup> 如1916年9月曾有讀者投書希望指示官話書報及討論「國語統一」問題，陳獨秀卻以「茲事體大」為由，認為「此業當期諸政象大甯以後，今非其時」來回應，顯見陳氏的興趣不大。見〈通信：答沈慎乃〉，《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10月），頁5。

<sup>(78)</sup> 〈通信：錢玄同致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頁11-2。

<sup>(79)</sup>由此便不難得知胡適所以會援引國語做為文學革命的內容，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之緣由了。胡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是這麼說的：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sup>(80)</sup>

胡適認為國語成為文學的主體，是希望作文章時要將自我内心的情感充分表達出來。換言之，語言本身應該是文章的形式和內容。在他心目中，「國語」和「國文」其實是有區別的。胡氏早在留美期間便體悟到「教死文字之法，與教外國文字略相似，需用繙譯之法，譯死語為活語」。<sup>(81)</sup>後來在對文學改革程序的意見裡，他更指出中小學校要教授的是「國語」，而非「國文」；「國文」主要指的是那些古文，其位置便等同於西文。而教授古文，應該要以「國語」來講解。<sup>(82)</sup>與胡適在一九二〇年代論學往來密切的學生顧頡剛，在他的讀書筆記裡曾有一段對「國語」的解讀。這段心得究竟撰寫於何時，已不可得

---

<sup>(79)</sup> 劉復，〈國語運動略史提要〉，收入氏著，《半農雜文》（上海：星雲堂書店，1934），頁212。

<sup>(80)</sup> 收在《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一，頁57。

<sup>(81)</sup>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758-64。又可詳參《四十自述》，附錄「逼上梁山」部分，頁97-131。

<sup>(82)</sup> 〈論文學改革的進行程序·胡適答書〉，收在《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一，頁80。

知，或許並非來自胡適的見解所啟發，但卻可作為註腳：

國語，無論何處人均可聽。文言文，無論何時人均可讀。待將來國語推行全國，即可代替文言文矣。（看元代詔書，書此）

文言文，即前人之國語也。若無此，我國古文獻恐將失去甚多。<sup>(83)</sup>

顧氏的解讀是從元代歷史來理解的。就他的這段話來看，每一個時代都有其「國語」。現今國語取代文言文的理由，是因為它不但具備書寫的功能，而且還有溝通（聽和講）的意義。顧頡剛說文言是「前人之國語」，儘管對「今人之國語」並未明言，可是綜合胡適與顧頡剛的看法，「國語」的定義就是適切而完整地表達個人想法的方式。對他們來說，「國語」無疑要的是一種進化到符合社會需求的語文。文言文在過去代表著所有士人共同表述的方式，可是今昔時況迥異；白話應該比較符合做為「國語」的條件。因此，文言也好，白話也好，只要合乎時代民衆的需求，便是「國語」。<sup>(84)</sup>

至於建設現代國家語文過程中，國家政策和市場的影響，使得白話更具優勢，教科書的改革即是一例。文學革命初倡之時，有許多贊

<sup>(83)</sup> 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三冊，「文言即國語」條，總頁3208。

<sup>(84)</sup> 即使是到採集吳地民謠時，顧頡剛也堅守胡適「死文字」和「活語言」的二元觀點，來看待方言的地位。見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1925年10月21日條，頁114-5。對此一構想，陳平原便曾指出：胡適的文學史發展觀念，係以「雙線的文學觀」為立論。認為文學發展的活力，最初是從民間開始，和主流卻僵化的死文學平行，最後甚至取代。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193-202。

同的讀者便稱教科書無法應用，<sup>(85)</sup>原因是大量的出版品都以文言寫成。文言既為出版書籍大宗——教科書——主要書寫形式，那麼推動白話文學想當然就勢難收效。非惟如此，更遑論一般市面流通刊物，以代表菁英知識階層的雜誌刊物固然無須置論，<sup>(86)</sup>即便兒童讀物作品情況亦復相同。<sup>(87)</sup>這種情況到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產生偌大的改變，教育部推出一連串的「審查教科圖書規程」，規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sup>(88)</sup>卻使得出版商不得不亦步亦趨。商務印書館在1921年為配合教育部政策，首先出版了《新體國語教科書》、《新法國語教科書》，同年十二月間中華書局也出版《新教育國語讀本》，後來這股潮流便蜂擁而起。<sup>(89)</sup>胡適晚年說執掌當時教育部的吳稚暉（1865-1953）、蔣夢麟（1886-1964）、劉大白（1880-1932）等人「實在是文學革命的同志」，<sup>(90)</sup>意即在此。

出版資本主義（press capitalism）主導市場風氣，更是促成國語與白話普及的關鍵因素。胡適、陳獨秀等文學革命健將，和出版界關係

<sup>(85)</sup> 〈通信：關於新文學的三件要事〉，《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年11月），總頁638。

<sup>(86)</sup> 例如：科學社的刊物《科學》雜誌，最初便以文言方式撰文，羅家倫（1896-1969）認為中國文言本身有許多分歧地方，仍令讀者看來很費力，若以白話文行之，應會更眞切明瞭。見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第1卷第4號（1919年4月），總頁628。

<sup>(87)</sup> 吳研因，〈清末民初以來我國小學教科書概觀〉，原文未見，收入張靜廬輯註，《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150-2。

<sup>(88)</sup>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頁113。

<sup>(89)</sup> 同前書，頁117。

<sup>(90)</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頁71。

互動素來良好。胡適曾在1921年7月商務印書館打算全面進行改革時，為其擘畫有關事宜。從胡的書信往來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一九二〇年代初期，胡氏經常受友人所託，代向商務求售書稿或謀覓職位。<sup>(91)</sup>更值一提的是曾在商務服務的高夢旦（1869-1936）大約在同一時期有封預備給林紓的信，內容大意在以出版界的立場勸解文言、白話之間的紛爭。這封信後來並沒有輾轉到林紓手中，因為商務長期出版林譯小說，高氏「終不忍出此書，以傷其心」，可是卻隱約透露出市場對於壓縮文言生存空間的關連。高在信中說：

新思潮既發生，白話文盛行，風氣大變，採用書籍，迥非昔比。書館為書業機關，豈能逆潮流而行，置數百萬之資本、數千人之職業於不顧？……鄙意多數小兒，宜以白話文求智識，………此間編輯教科用書，本以普及教育為職志，故不能不注重白話文，以期養成多數國民之智識。<sup>(92)</sup>

高夢旦還提到，由於自己「不能白話文，勢不足以應時勢之需要，頗思求可自代者」，結果找上了胡適。很顯然的，出版界的改革的確也反映了現實市場的需求。

做為民國的利器，白話與國語不僅要擺脫帝制時期的語文，而且

---

<sup>(91)</sup> 相關討論已有詳盡的研究，見沈松儒，〈一代宗師的塑造：胡適與民初的文化、社會〉，收在周策縱等，《胡適與近代中國》，頁154-5。

<sup>(92)</sup> 這封信後來有一打字印本備份遺留在胡適的日記。見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1935年5月11日條，無頁碼。

試圖建立現代國家的一統語文。西方許多研究新興國家興起的討論裡，不約而同地都指涉單一語言文字的建立，對喚醒潛在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語文的單一化不僅將有益於提升普及廣大民衆識字率的理想，並且促成意識型態或加強共同情感認同的滋生。<sup>(93)</sup>我們從清末民初以來白話文運動的發展也可窺見一二。白話代表的是普羅民衆的工具，它與帝制時期的文言所具備的身份不同，既無傳統考試制度做為依附，而且是溝通地方方言的管道。在此一基礎下，隨著出版事業逐漸蓬勃，尤其是大眾出版品的生產與消費，同時也促使「國民」意識的出現。<sup>(94)</sup>從「國家建構」的角度來看，確實不無關連。<sup>(95)</sup>

## 五、結論

<sup>(93)</sup> John Edwards, *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p. 23-46；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ch.5, pp. 67-82；Ernest Gellner著，李今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41-51。

<sup>(94)</sup> 最近李歐梵的一篇文章，便討論到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東方文庫」、「萬有文庫」，對知識大眾化及創造「國民」意識的影響。見Leo Ou-fan Le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in Urban Shanghai: Som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s," in Wen-hs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the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31-61.

<sup>(95)</sup> 關於中國的討論，可見John de Francis,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2).

最後我想從兩位和胡適有過不同看法的人出發，來檢討〈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內容所呈現的意義。這兩人的看法都有發表類似支持的意見，大致都在一九三〇年代前後。首先是周作人的討論。周氏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指稱：中國文學的歷史發展，約略可歸納為「載道」和「言志」這兩種相互且反對力量的起伏，無論過去或將來皆是如此。他又認為民國以後的白話文學運動，其實是正處於「言志」的文學思潮階段。<sup>(96)</sup>周的看法是將白話文運動放在歷史的脈絡裡觀察，是「載道」與「言志」互為消長的結果。這一觀察曾獲致時人的贊同，甚至以為「新興普羅文學為載道思潮之再起」。<sup>(97)</sup>

另一位為浦江清（1904-1957）的看法。1928年浦氏在分析文言和白話問題時，提到胡適推行白話文之所以成功，固係時勢所然；可是究其原因，其實有二：一則為外來翻譯語言的影響，另一則為統一國語的需要。他還進一步指出，特別前者是白話文學所以能夠普及的主要因素；因為「考之歷代，每一種翻譯文學產生，即可見白話文字之活動」。<sup>(98)</sup>關於近代中國因為翻譯外來著作而導致的影響，確如浦江清所言，是促使白話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傅斯年、瞿秋白（1899-1935）都有過相同的言論，認為翻譯著作內容中

<sup>(96)</sup>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頁45、53、55-6。必須指出，周作人此書原為1932年3、4月間應輔仁大學之請，以「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為題的演講。

<sup>(97)</sup> 該書的評論見：《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47期，1932年9月26日，第八版。

<sup>(98)</sup> 〈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3期，1928年6月11日，現收入氏著，《浦江清文史雜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頁10-11。

對於有關新的社會現象、關係，乃至事物、觀念，因為原來舊有的語法不足以表達，結果終將創造許多新的名詞。<sup>(99)</sup>他們的看法並非全無所見。然就浦氏說法而言，他是衡諸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來立論的，卻難以完全解釋近代中國白話文所呈現的意涵。

從周作人和浦江清的分析，一九三〇年代中國對民初白話文運動發展都普遍視為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他們的論點都與胡適有所出入。然而本文上述的討論可知：清末民初文言與白話地位的轉變，也許可自雙重層面——即社會和情感的互動來看。從社會結構來說，清末民初在西力衝擊之下，政治與制度的改革成為間不容緩的趨勢。這些變革如廢除科舉、辛亥革命等，儘管雖是客觀的外在條件，卻讓社會內部產生諸多的變化。最重要的變化無疑是來自於心態方面的：譬如傳統的「士」為求改革，努力改良「啓蒙」的工具，但在科舉制度廢除以後，卻必須歷經知識發言權和官方統治權的邊緣化，他們的角色和地位開始逐漸模糊，取而代之地是四民平等的知識分子社會。此外，近代中國思想逐步地激進，反傳統情感遂為普遍的特色，再加上辛亥革命的爆發，造成民主共和的局面，具有復辟色彩的讀經運動不免引起反感，自然造成文言的地位低落。在這兩方面相互激盪之下，使得白話與文言的地位逆轉，白話更成為建立現代國家式語文的目標。就這兩項層面來觀察，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所提到的文言、白話問題和線索，就不僅僅只是新、舊勢力文化認同與衝突而已，並

---

<sup>(99)</sup> 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頁179；瞿秋白的看法見於：魯迅，〈關於翻譯的通信〉，《二心集》，收在《魯迅全集》，第四冊，頁373-4。

且也說明這段歷史發展的進程裡，情感和社會持續互動變化後所帶來的後果。

近代中國對於文言與白話的抉擇，無疑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當然白話文的勝利，也絕非胡適所言業已完成。一九三〇年代以後在瞿秋白等人所推行的「大眾語運動」，則激起另一波白話文學的熱潮，<sup>(100)</sup>但顯然問題焦點已非全為文言與白話間的爭論了。

---

<sup>(100)</sup> 相關研究可詳參：Li Hsiao-ti, “Making a Name and Culture for the Masses in Modern China,” *Positions* 9.1 (Spring 2001): 29-68.

## **Interactions between Feelings and Society: The Transformed Positions of Vernacular and Literary Languag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Chih-hung Lin

###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ree dimensions from Hu Shih's "Fifty years recently in Chinese literary",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arguments of vernacular and literary language in early Republic China.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mentalitie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a long-term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rocess. The first section is that the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made a distinction of "ours" / "theirs" with the complex feelings to enlighten common people. In other words, intellectuals were called on people by literary language, but they still wrote with vernacular.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wo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he 1905 abrogation of civil examination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Both of these changes were further impelled to transform the positions of vernacular and literary language. For instance, the writing of vernacular always viewed as a symbol of monarchic restoration. The last part, for the purpose of state-building, literary language became to a "national language" which accompanied with the market of press capitalism. It is sure enough all of these developments of vernacular and literary language were results from "interactions between feelings and societ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Keywords:** vernacular, literary language, national language, Hu Shih,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